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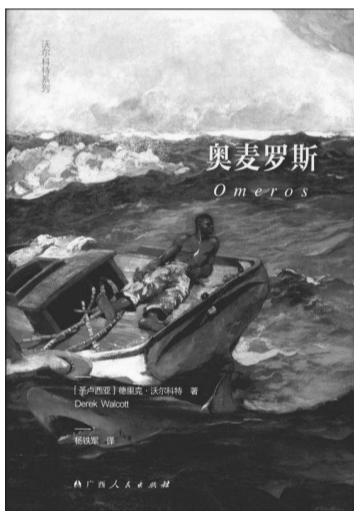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近日公示,《奥麦罗斯》(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品牌出品)及译者杨铁军获得文学翻译奖。《奥麦罗斯》是诺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创作的一部史诗,共七卷八千余行,以三行体诗写成,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原型,以渔民赫克托和阿喀琉斯争夺美丽的海伦为主要线索,通过众多来自现实、梦境、历史、经典的人物,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因其宏大的篇幅和深远的艺术维度,《奥麦罗斯》构成了对翻译的巨大考验。译者杨铁军用多年时间数易其稿,修订打磨,他说,“对沃尔科特的译者来说,难处原来根本不在于对原文的理解,而是如何在汉语中找到一种适合他的风格”。

## 史诗《奥麦罗斯》中译版是怎样炼成的

■杨铁军

《奥麦罗斯》的翻译对我来说挑战性最大,下的功夫最多,收获也是最大的。当时我还在美国,每天晚出早归上班,懒散得很,什么也没做,心越空,反而越被空填满了。一早一晚,在森林里走几个小时的路,排遣排遣心情,排遣到排遣本身也需要排遣了。小龙(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在微信上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我的那个“懒我”下意识就推托了。此前也是应小龙之约,翻译希尼的晚期诗集《电灯光》,艰辛情境,历历在目。

过了一阵子,我的“勤我”鼓起勇气,质问“懒我”：“你不总是焦虑不安吗,你不经常说时不我待吗?闲着也是闲着,这不是荒废时日吗?”“懒我”为了对得起“勤我”的良心,也为了能把自己给骗过去,只好万分不情愿地应允了。于是二我归一,事情就这



样定了。虽然不管哪个我,对今后几年的大大超出预期的各种困难,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无从准备。

确实,《奥麦罗斯》作为一部规模庞大的史诗,真到了翻译的时候,便如汪洋大海,每在惊涛骇浪之中,难窥天日之时,“懒我”都会出来指责一下“勤我”。最大的问题是,在翻译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其在汉语中呈现出来的平淡、冗长深感不安,完全没有我想达到的汪洋恣肆的效果。记得翻译到一多半的时候,我已经有点丧失信心。每一行都是煎熬,每一页都加深了已经沉到底底的怀疑。但是,必须挺过这些怀疑,一步一步,蹚过晦暗不明的丛林,不可能指望奇迹。就这样,凭着残余的纪律性,慢慢地完成了初稿。沮丧之余,我在停顿了几个月后,开始修订。

在漫长的修改过程中,我反而会体会到了最大的欢乐。《奥麦罗斯》采取了《神曲》的三行体,有一种一浪一浪、汹涌不绝的节奏,如何在汉语中呈现它,本来就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此次翻译的核心所在。认识到困难所在,就等于抓住了解决的线索,我的沮丧原来都是错付。我把前面几章作为样本,反复琢磨,一遍一遍修改,大改不下六七次,小改起码有六七次,在调整的过程中定调,在定调的过程中调整。修订伊始,我并没有什么期待,只有不能提供任何担保的过往经验可依靠,剩下的就是挣扎,似乎一切都是运气。当我终于找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其实是明白的,



《奥麦罗斯》译者杨铁军

因为它充满了欣喜。

调子定了,就有了方向,但全诗八千多行,每一行都得按新语调整重新衡量,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全书规模的大改。经过这次大改,我把草稿搁置了几个月,完全不去想它。当我从头上捡起,感觉还可以进一步精简,每一行都可以再减两到三个字,把意义压缩在更有张力的诗行中,效果只会更好,于是就有了全书规模的第二次大改,对每一行都做了如此的精简,梳理意义和结构,重新处理当时因“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的含糊之处。

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的认知,我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对语言控制力的提高,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酬劳吗?

《奥麦罗斯》在国内有一种艰涩的名声,因为艰涩符合国内很多诗人对诗的期待,在了解甚少的时候,大家对《奥麦罗斯》似乎不断探索才有柳暗花明的可能。我“幸运”地找到了这个办法,一切都好像是命定的,但只有自己明白其中的曲折。在修订期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工作一下紧张起来,每天只有下班后的两三个小时可资利用,往往还筋疲力尽,做不了太多。但好在剩下的修订,大多按部就班便可以完成的,碎片化的时间也无妨思路。

《奥麦罗斯》的风格绝不能说是平易的。全书自始至终华丽非凡,意象的爆发让人目不暇接。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其华丽表层之下,运行的古希腊式理性。不管现象多么纷繁,都历历分明,清晰可辨。沃尔科特把握住了自己作为黑人和白人混血的独特身份,用同等重要的地位将两者映射于作品中,通过一个似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加勒比海与西方经典的平行互通结构,让诗意在错位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张力。沃尔科特因此冲出了由T.S.艾略特开启的现代长诗的定义,开辟了一个浩瀚的诗学空间。这

样的写作在后艾略特时代,既让人意想不到,又全在情理之中。沃尔科特拒绝循规蹈矩,拒绝在现代派的夹缝里匍匐,这个做法本身就很有意义,更不用提他的光芒四射的文本本身。

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诗学是有启发意义的。艾略特的长诗,在当时是一种文体的解放,但在某种程度上断绝了长诗的可能性,自此之后,所有的长诗都不约而同地向《荒原》看齐,在文体上更激进一步,作为确立自身诗学的法门。包括很多中国当代诗人的长诗,都是如此。这些努力基本上都可以算失败的、无效的,尽管它们的企图,无一例外,都是纳入最当代之生命经验。这种企图最后往往沦为滑稽可笑的东西,与其庄重严肃的目的形成极大的反差。固守先锋的姿态,反而成了保守的反动。沃尔科特也许是不能效法的,但沃尔科特在长诗的“荒原”中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在此前及此后所有的失败之作中显得异常醒目,即使不能归之于完全的成功,相对来说最站得住脚,却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希望沃尔科特的实践,能起到帮助中国当代诗人开拓思路的作用。

“大雅”书系能出版这样一批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人文观念有借鉴意义的作品,功莫大焉。从选题到最后出版,在现今的环境下,都需要绝大的勇气和见识。我作为译者,也在翻译过程中也得到了认识上的反思,以及诗学感受力的成长。当时的惘然,都成了可待的追忆。

## 孙犁与《人民日报》

■宫立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人民日报70年散文选》收录了孙犁的《昆虫的故事》《谈镜花水月》。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笔者想就“孙犁与《人民日报》”这一话题略作梳理,以为纪念。

孙犁可谓《人民日报》的资深作者。据笔者统计,孙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多达50篇:《烈士陵园》(1965.9.18)、《幻华室藏书记序》(1981.2.23)、《读一篇散文》(1981.7.4)、《文集自序》(1981.9.2)、《小说与伦理——小说杂谈》(1981.10.20)、《叫人记得住的小说——小说杂谈》(1981.10.30)、《小说成功不易——小说杂谈》(1981.11.6)、《小说是美育的一种——小说杂谈》(1981.11.13)……

孙犁在《人民日报》发表作品,始于1965年,终于1995年,时间跨度达30余年。绝大部分署名“孙犁”,只有《芸斋小说两篇》和《芸斋小说:罗汉松》署名“孙芸夫”,《觅哲生》署名“孙犁”,《闲情》署名“芸斋”。既有别具特色的芸斋小说,也有一针见血的“芸斋杂谈”。既有对小说鞭辟入里的分析,也有对散文的深入阐发。既有序跋,也有书信。

孙犁在给《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刘梦岚的信中坦言:“几十年来,我在你们的副刊发表了虽然不是很多,也算不少的文章。就是说占了副刊不少宝贵的篇幅,得到了你们的热情关怀,我们之间建立了工作友谊。对我来说,是很值得纪念和感谢的。你们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例如我在副刊发表的《芸斋小说》,其中一篇,删去三个字。我看了以后,觉得删了比不删好,在结束出书的时候,就按你们的样子

安排了。”

孙犁在《改稿举例》中举了五例编辑的优秀的改稿案例,其中两例都是出自《人民日报》。一是《文集自序》,“这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文章有一段概述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涉及时代和社会,叙述浮泛,时空旷远。大概有三百余字,编辑都给删去了,在文末有所注明。在编入文集时,就是用的他们的改样。因为,文集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冗,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

孙犁自己从事创作,“深知创作之苦”,对于自己的文字也非常看重,他反感别人任意地大砍大削自己的文章。同时他又常年从事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他“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所以“对于编辑部



提出的,个别文字的修改,我从来是认真考虑,虚心接受的”。孙犁认可《人民日报》编辑对作者“严肃认真”的真诚态度,欣赏《人民日报》“编辑和作者之间,真正的、有见地的、大公无私的分析 and 讨论”,自然乐于投稿给《人民日报》。

孙犁和《人民日报》编辑之间,不单单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还是真诚的朋友。《孙犁文集》补订版第10卷收了孙犁给刘梦岚的信多达25封,给姜德明的信多达111封。单从书信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孙犁与《人民日报》编辑的联系之紧密。刘梦岚还对孙犁做过深度访谈,题为《寂寞之道与“赤子之心”——访孙犁》,《人民日报》1989年4月3日、4日进行了连载。孙犁自己非常认可这次访谈,他对刘梦岚说:“你提问题提得好”,“你整理得好”。

刘梦岚还给孙犁编过一本散文集,名为《芸斋梦余》,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2007年1月再版。这本散文集,既有记事、怀人散文,也有各种读书笔记、书衣文录、序跋、杂感,琳琅满目。书名也不错,借用的是书中一篇散文的名字。孙犁是一个“坦诚、耿介、敢于直言的老战士”,是一个“涉猎广博、学养深厚的老学人”,刘梦岚是懂孙犁的,她对孙犁各类散文的分析也都透彻,可谓知人之论。

孙犁生活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刘梦岚也都记挂在心上。孙犁在1991年11月5日给刘梦岚的信中提到:“神功袋,从春节,我就戴上了,这种药袋的确不错,主要是使肚脐得到保护,夏天我也没敢取下,一直用着。天津也很好买,孩子有熟人,得到很方便,您就不必惦

记再买了。我给您汇去四十元,这是因为您收入有限,又有孩子,开支很大,我心里不安。您的心意,我是全领了。我想您可以理解。”

孙犁给《人民日报》投稿,一般都会静待编辑的消息,但也有例外。孙犁1981年5月15日致信贾平凹,其中提到:“‘五一’节在《文艺周刊》,看到你短小的散文,马上读了,当天写了一篇随感:《读一棵小桃树》”,寄给了《人民日报》副刊,直到今天还没有消息,我已经托人去问了。如果他们不用,我再投寄他处,你总是可以看到的。文章很短,主要是向你表示了个人衷心的敬慕之意。也谈到了当前散文作品的流弊,大致和你谈的相似,这样写,有时就犯忌讳,所以我估量他们也可能不给。”2天后,孙犁致信姜德明:“半月以前,寄贵报副刊一稿,题为《读一棵小桃树》,系文艺随笔性质,信封写‘寄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版’(当时你不在家)。请向看副刊稿的同志问一下,此稿收到否?如不能用,仍寄寄还,因系原稿。”查《人民日报》《孙犁全集》《孙犁文集》补订版,始终不见《读一棵小桃树》。这篇文艺随笔究竟刊出了没有?是否“不翼而飞”了?其实没有丢,并且刊出了,1981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刊出时的题目,不是《读一棵小桃树》,而是《读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定稿于1981年4月30日,迟至7月4日才刊出,的确时间有点久。不过也可以理解,孙犁在这篇文章中的确有些“犯忌讳”,谈了“当前散文作品的流弊”,话说得很直白,一针见血。即使如此,《人民日报》还是“义无反顾”地刊登了孙犁这篇“写真话的散文”。孙犁不

轻易写评论,除非是“尊重之作”及爱重之作”,“纯是良好用心,并有知己之想”。他感觉《一棵小桃树》无论是内容还是写法都“很新鲜”,所以就写一写他的观感,并由点及面,谈一谈他对当前散文的看法。

此外,在《人民日报》的编辑中,孙犁最熟的,不是刘梦岚,而是姜德明。孙犁与姜德明都是散文家,都常年从事编辑工作,彼此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俩人虽然见面“最多三五次”,但书信往来很多。《孙犁文集》补订版第10卷收了孙犁给姜德明的信多达111封。单从书信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孙犁与姜德明的联系之紧密。姜德明在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的《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的《小引》中说:“我现存孙犁的书札始于1980年10月,止于1995年7月。但,我记得与他交往的时间略早些,大概是1977年的秋天。那时,经我手,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他写的《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从此,我一直紧追他不放,催他写稿。”经查,《忆晋察冀的火热斗争生活——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刊于1978年3月20日出版的《上海文艺》1978年第3期,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的《晚华集》时,才改题为《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人民日报》并未刊出过《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不过姜德明与孙犁的交往应该还是比较早的,是多年的老朋友。

姜德明除了编发孙犁的文章,还写过不少关于孙犁的文章,比如《读〈被删小记〉之余》《读孙犁的散文》《少年鲁迅读本》《津门小记》《孙



孙犁

犁印象》《怀念孙犁》《爱情滋味》,编著了《孙犁书札:致姜德明》。姜德明对于孙犁的小说、散文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孙犁的《芸斋小说》“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傳統,大多篇幅很短,意蕴深长,与时下流行的小说样式有别”,孙犁“偶尔也写一点新诗,但更多的是在写散文,写那种说真话的散文”。

《人民日报》也发表过不少关于孙犁的文章,比如铁凝的《四见孙犁先生》、韩映山的《孙犁的真诚》。

除了《人民日报》,孙犁还在《人民日报》的文艺增刊《大地》发表过《与友人论传记》(1981年第3期)和《读萧红作品记》(1981年第6期),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过读书笔记,比如《读〈吕氏春秋〉》(1986.12.13)、《读〈燕子〉——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1987.1.10)、《读〈棠阴比事〉》(1987.4.2)、《买〈宦海指南〉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孙犁年谱长编”[19BZ125]的阶段成果)